

陶行知

徐大文 刘大康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X825.4
32-5

陶行知

徐大文 刘大康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B 232291

127

陶 行 知

徐大文 刘大康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印张3.12 插页2 字数55,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 11354·051 定价: 0.55元

责任编辑 陆钟琦



陶行知像

目 录

一、青少年时代·····	1
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7
三、坚强的民主战士·····	15
四、大众诗人·····	26
五、晓庄师范学校的创始人·····	33
六、组织山海工学团，提倡“小先生制”·····	41
七、建立新安旅行团·····	49
八、两次被通缉·····	55
九、海外二十八国(地区)之行·····	62
十、战火中成长的育才学校·····	73
十一、创办社会大学·····	82
十二、爱满天下·····	87
十三、安息吧，党外布尔什维克·····	98

一、青少年时代

大哉陶子！陶子陶子。

陶子以前，无一陶子；

陶子以后，万亿陶子。

大哉陶子！陶子陶子。

这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同志在陶行知照片上题的赞美诗。那么，陶行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陶行知，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生，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来，他的祖先迁居到安徽古溪地方；不久，又移居古老的城市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城西黄潭源村。这里属安徽省南部，郁郁葱葱的黄山绵延不绝，新安江清澈宽广的江水流淌不息。当时，该地人烟稀少，山青水秀，茂林修竹，风景十分宜人。

据陶氏家谱载，一世祖名国宁公，陶行知是陶氏第十六世。说也奇怪，陶家十二世、十四世每代都是子女四人，陶行知的父母也生了二子二女。但是长子长女都不幸幼年夭折，只剩下次子文浚，乳名小和尚（即陶行知）和二女美珠（即陶文渼）。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很早接管了祖上留下的一片亨达

官酱园，生意还算兴隆。后来因为社会经济萧条，而且当地官商林立，“大鱼吃小鱼”之风盛行，他虽然惨淡经营，奉公守法，酱园还是被迫破产倒闭。位朝没法，只得回家务农，依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活。陶行知的母亲叫曹翠仂(lè)，是一个慈祥厚道的农村妇女，因为家境清贫，除管理家务外，还要下田耕作。她勤劳节俭，终日劳动不歇，甚至连丈夫、儿子和孙子的理发，都由她包办，以节省些钱来补助家用。这里有陶行知自己写的《吾母所遗剃刀》一诗为证：

这把刀！

曾剃三代头。

细数省下钱，

换得两担油。

这时候，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侵略正方兴未艾，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旧中国的穷乡僻壤。长江流域一带，到处建立了耶稣教内地会，歙县小北街也有内地会。陶父为该会会员。因家境困难，经人介绍，陶母进了教堂帮佣，除负责炊事外，兼做勤杂工。父母亲艰苦勤劳的优秀品质和诚实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陶行知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从小聪敏。当他五岁尚未开蒙识字时，有一次，他步入邻居家厅堂，看到一副对联，就在地上临摹起来。这情景恰巧被旻村蒙童馆塾师方庶咸

秀才看到，视其为神童，非常喜爱，愿收作弟子。但陶家因家贫，无力供行知就读，行知时常暗自伤心。六岁时，方秀才一再动员陶父，声明不收束脩，代为开蒙，他才得入馆就读。

陶行知小时候识记能力很强。据说在三刻钟内就能熟读并背诵《左传》四十三行，所以受到父母亲的疼爱。有一年春节，父亲带他去休宁县万安街外公家拜年，外祖父母见外甥聪敏过人，即着意培养，留他在蒙童馆吴尔宽先生家伴读。半年以后，他父母又因经济拮据，把他领回家中，让他一面自学，一面劳动。陶行知经常挑菜去县城，顺便看望母亲，帮助她做些勤杂。日子久了，被崇一学堂堂长(校长)英人唐进贤发现，喜其聪明勤劳，免费让他入学。这时候陶行知才十五岁。

崇一学堂是一所不分初高中的中等教会学校，教学十分严格。功课除英语外，还有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陶行知学习认真，成绩突出，三年功课两年修完，提前一年毕业。他在崇一学堂读书时，曾挥毫在寝室的墙壁上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充分表达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

年轻的陶行知，无限向往外面的广阔天地，师友们也鼓励他出外求学。陶行知眼看旧中国贫穷落后，文化科学不发达，庸医误人，自己的哥哥、姐姐先后

早殇，想起自己在崇一学堂曾学过医药知识，因此产生了医药救国的思想，他下决心去投考杭州的广济医学堂。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里人，慈祥的父母为了不埋没儿子的志向，克服了种种困难，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九〇八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父亲亲自送儿子搭上开往杭州的风帆船。三十年后，陶行知回忆起那次和家人初别时的情景，不觉心酸泪下。他写了一首动人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古城岩下，
水蓝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的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到了杭州，陶行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广济医学堂。他满怀喜悦，想从此专心读书，将来学成行医。但哪里知道这所教会办的学校，规定信教的学生才能享受免费待遇。他不愿接受洗礼，反对学校

因学生的信仰不同而待遇互异，自己又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学习费用，于是，便愤然离开了杭州。他孑然一身，前途茫茫，往哪里去安身呢？贫困的生活，开始考验着这个年轻人。他穷途末路，不得不投奔到苏州表兄张志白家待学，但见到他表兄在绣花庄工作，经济也相当困难，只好自己典卖衣物以换取每日两餐。这给他以后艰苦办学、助人为乐、为民立言奠定了思想基础。

半年后，在他十八岁时，得到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的资助，考进了南京著名的金陵大学预科，开始探索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学习中，他受到宋代理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学说的影响，改名“陶知行”。

他在金陵大学学习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受到民族民主思想冲击和熏陶的陶行知思想活跃，乐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主编过该校《金陵光》（中文版）学报，积极组织爱国演讲，举办爱国捐，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他学习认真，博览群书，不仅文科成绩优异，而且理科知识也十分丰富，经常帮助同学解答数学上的疑难问题，深受师生们的赞扬。后来他总结出读书十诀：一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二勤，业精于勤，荒于嬉；三恒，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四博，从精出发，博览群书；五问，不耻下问；六记，多动笔墨，多记笔记；七习，温故而知新；八专，专心致

志，专一博广；九思，多加思考，学会运用；十创，触类旁通，敢创新路。毕业时，他写的一篇论文《共和精义》，说理透彻，论据充分，居全校之冠。校长美国人包文，对他十分器重，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上进，赴美深造。这时，陶行知心里也有“乘风破浪万里浪”的雄心壮志，准备吸收“西洋文明”以振兴中华。可是，出国留学谈何容易！他需要很多的钱，这些钱向哪儿去筹借呢？除了包文答应资助一部分外，他只得抱着“十扣柴门一扇开”的微渺希望，向至亲好友处求助。经过许多周折，终于筹足了赴美学习的全部旅费。他无比兴奋地踏上了万里航程，远渡重洋。

到了美国，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其中有一门学科是“教育行政管理”，当时导师是柯夫曼。这位导师热心辅导，循循善诱，促使他产生了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志向和决心。所以人们都说，柯夫曼是陶行知从事教育事业的启蒙老师。后来他认识到学习市政学将来只能做官，不能救国，于是半年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他的导师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从此，他便树立起了献身教育的目标。

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认为教育可以救国救民，因此，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一七年学成回国。他在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曾经豪迈地说：“我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以后也是朝此目标去做的。

他回国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了教学生涯。他抱着改造中国教育的宏愿，仔细考察研究了当时各级学校的教学实况。他发现所有学校都还采用着过去不合理的教学方法，即教师教，学生听；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毫不联系实际。他想，这样下去，不是要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他十分难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认为学校里的教和学是不能分离的，应该教学合一。教师的责任不完全在于教，而应当同时注重教和学，教导学生如何学习。因此，他在学校的校务会议上，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当时那些身居高位的教授们怎会瞧得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于是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

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有的对他嗤之以鼻，有的甚至大声喝斥。但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以示不妥协。尔后，陶行知陆续发表了《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教学合一》等论文，批判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革。五四运动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终于把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并继续进行改革：试行选科和学分制；提倡男女同校，招收女生；开办暑期学校，教居民识字等等。陶行知的部分教育思想得到了实现。

在一个月明之夜，陶行知和几个知己朋友在校园里散步谈心，有人问他：“知行，谈谈你将来的抱负！”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新文化的道路。那时“平民思想”深入人心，陶行知表示，他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

一九二三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校名）的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主办《新教育》杂志，发表许多改进中国教育的文章。在这个时期，他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声称要以“佛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推行平民教育。他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教材，并奔走于南京、安庆、北京、南昌等地，创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便利群众识字。他还在自己家中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鼓励儿子教祖母识字。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热心平民教育是由于我自身的平民性。他在给妹妹文溪的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他希望能用平民教育“来挽救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

但是，平民教育运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侵略，二者相互勾结，统治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不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想利用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正在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陶行知逐渐醒悟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要使国富民强，必须使教育与农业携起手来。于是，他提出了“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为了改造中国的乡村教育，陶行知决心要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要募集一百万元基金，

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他为乡村教师题写了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鼓励他们献身于乡村教育。

一九二六年年底，陶行知怀着改造旧中国教育的强烈愿望，舍弃教授生活，辞谢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和吉林大学校长给他的聘请，毅然离开舒适的城市，和赵叔愚教授一起，来到南京和平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建立了第一所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现今的晓庄师范。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举行入学考试，考生有操震球、戴伯韬、李楚材等十三人。考试科目之一是开荒。劳动完毕，陶行知兴奋地对他们说：“今天的考试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们的劳动成绩很好，足足可以打上一百分。”

三月十五日，在开学典礼上，陶行知作报告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陶行知不怕吃苦，为了乡村师范的事业，愿意“用整个身子干下去”。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到了新年也不回去，仅仅写信给家里人拜年。他在家信中写道：“晚上打地铺，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我们六个人睡在一铺……一条耕田的水牛，睡在我们旁边，脾气很好，也很干净。”在另一

封家信中告诉他母亲说：“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象活神仙一样。整天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他爱农村、爱学校胜过爱家。

陶行知以晓庄师范为试验基地，创建了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它的体系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三部分组成的。有人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他美国老师杜威“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的翻版。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诚然，陶行知初期是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很尊敬杜威，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实践，他认定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他把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即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组织儿童学习，“以儿童为中心”，把各种实际作业交给儿童，使之从“做”中获取知识，培养他们成为美国的干练公民。陶行知强调人们要通过亲身实践得到直接经验，而且主张让儿童通过接受他人的认识成果来掌握间接经验。他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把学校的教学与生产联系起来。他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劳动观点与劳动习惯。这些对传统教育的挑战，是他创办“人民教育”的基本特征。他所要培养的是为国为民谋利益的有用人才。

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问题上,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即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学校里的一切教育活动,都要实现社会的生活,要求学校社会化,使美国少年儿童习惯于美国的现实社会生活。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这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实际生活的本身就是教育。教育必须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服务,为人生服务。他提出“社会即学校”,即生活教育应以社会为学校,奉自然为宗师,学习的范围广阔无边,“随手抓来的都是活书”。他主张“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这是他生活教育的教学论。晓庄师范就以此为校训。陶行知指出:“行动是思想的母亲。”他批评杜威的思想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他批评杜威的设计教学法是“教而不做”。陶行知希望农村教师都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后来,陶行知又加上了“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两条,作为培养乡村教师的目标。

由此可见,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革命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吴玉章同志曾经说过:“生活教育理论就是教育革命的理论,也是革命教育的理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同日而语。